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容 闳

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字达萌，号纯甫。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该校校长塞缪尔·勃郎赴美留学，接受预科教育，1850年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

回归报祖国

作为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容闳完全可留在美国找一份称心的工作。但是他拒绝了各方的挽留，于1854年11月，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从纽约乘“欧里加”号货船毅然回国。次年3月，容闳抵达香港，这时，他已把本国语言几乎全忘了，只得先在广州补习汉语。

容闳归国后，先担任了美国驻华外交官伯驾的秘书，每月只有15块大洋的微薄工资，他委屈求全，想通过伯驾的关系结交一些中国政府官员。然而事与愿违，容闳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受到伯驾的奚落，他一气之下，辞职去了香港。在香港，容闳通过友人介绍，在高等审判厅担任翻译，并试图报考律师。后来由于英籍律

师的排挤,容闳无法在香港立足,不得不愤然离开香港前往上海谋生,又在上海海关担任翻译。进入海关工作后,容闳很快发现外国人实行的是内外勾结进行各种营私舞弊的勾当,他们以“太上皇”自居,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一次他问上海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如果一直在海关任职,是否有晋升税务司的希望。李泰国却回答说:“不论是你或者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有这种希望。”容闳听后十分反感,认为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尽管李泰国答应将他的薪水提高到每月 200 两银子,容闳还是毅然辞去了在上海海关的职务。

此后,容闳担任过上海好几家洋行的职员,其中包括著名的英国宝顺洋行。容闳虽然经商多年,却始终不肯当买办,他曾拒绝出任宝顺洋务驻日本的买办。他对英国老板说:“买办一职,虽然薪俸优厚,但却极为卑贱。”英国老板事后对人说:“容闳这个人虽然贫穷,但却骄傲。”

寄望于太平天国

容闳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十分关注太平天国起义的进程。回国后,他目睹清政府残酷镇压起义群众,便产生了投奔太平天国的想法。1856 年容闳在香港当翻译时,结识了洪秀全的族弟即后来被封为干王的洪仁玕。1861 年,容闳为了了解太平天国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同曾兰生及两个美国传教士从上海出发,到达天京访问。

容闳沿途看到太平军纪律严明,保护百姓,又听说忠王李秀成用重赏延揽人才,并严惩残害人民的部下,于是对太平军产生了好感,希望通过太平天国来实现振兴中国的计划。容闳在天京受到洪仁玕的热情接待,他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按科学原则组建一支军队;设立一所武备学堂,以训练有能力的军官;为海军建立一所水师学堂;组织一个文官政府,聘用有才干有经验的人为

各行政部门的顾问；设立银行，厘定度量衡标准；设立面向民众的学校，设立各类实业学校。容闳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权愿意实施他的改革措施，并提供经费，他将乐意效劳。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十分重视，并同容闳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由于条件艰难，洪仁玕表示这些建议暂时还无法加以实施，容闳非常失望。

容闳在天京住了一个多月，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既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人民觉醒的伟大意义，同时也看到了它落后腐朽的一面，因此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太平军能取得全国政权从而使中国振兴。洪仁玕很想将容闳留在天京协助自己工作，并封容闳以义爵，容闳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于1860年12月离开天京返回上海。容闳不得不将振兴中国的希望转而寄托于其他政治力量。

引进制器之器

容闳从天京回到上海后，曾想从贸易入手，先取得巨额资金，再以雄厚的财力，去实现他的宏图，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一设想。就在这时，曾国藩正为办洋务而网罗人才。经李善兰、张斯桂等人推荐，曾国藩对容闳很感兴趣，急于罗致幕中，以供驱策。容闳也想依靠曾国藩这个实力派人物，实现其将西学传播于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理想。于是，容闳于1863年9月到达安庆，入曾国藩大营，开始了他同洋务派结合的经历。

当时，曾国藩已经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令华蘅芳、徐寿等试造船、炮。这次召容闳来，就是要与他计议如何扩建一家新式机器厂。容闳认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机器厂，应该以通用的和基础的为主，不宜专供特种用途。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当有许多制作工作母机的基础工厂，然后以此为母厂，派生出更多更好的子厂来，这样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分工合作，这实际上是要建立基础工业的思想，容闳力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曾国藩并不欣赏容

闷的工业化计划,他只想利用容闷在国外的关系,派他出国购买机器。两个星期之后,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闷为出洋委员,派他到国外去采购所需的各类机器。不久,曾国藩即授予容闷委任状,并赏给他五品军功。从此,容闷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开始为洋务派服务。曾国藩一次性拨给他购办机器的款项达6.8万两银子。

1864年初,容闷绕道欧洲前往美国,在马赛、巴黎、伦敦等地参观游览,了解欧洲的工业和社会状况。他在慨叹之余,愈发相信教育的重要性,认定中国要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对当时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容闷到达美国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联系厂家签订合同。1865年,容闷订购的一百几十种机器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这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曾国藩对容闷按计划完成任务,表示赞赏和勉励,并专门向朝廷报功请赏。1865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授予容闷五品候补同知官衔,同时还任命他担任江苏省布政司衙门的译员,在上海驻节。当时任苏松太道的丁日昌,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办理洋务,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容闷在上海期间,与丁日昌成为莫逆之交。

1867年春天,容闷又倡议由中国人自己筹办一家轮船公司,特向清政府上《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建议从民间集资,通过自由竞争发展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以利沿海与内地的通商,打破外国资本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由于集股困难和得不到清政府的批准,容闷的计划虽未能得到实现,却是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先声。

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亲赴江南制造局参观。容闷乘机向曾国藩提出在江南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并给他们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可以由中国人完全独立自主地管理这家工厂,使用、维修机器设备,不再仰仗外国工程师。曾国藩采纳了容闷的建议,不久,这所机械学校开办起来,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首倡留学教育

容闳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对祖国被外国侵略者欺凌感到愤慨,一心想为中国的振兴寻找良策。在他看来,中国只有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尤其是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才是强国富民之上策。1868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提出以派遣青少年出洋留学为主要内容的四项建议,但因故被搁置。1870年,容闳以翻译的身份参加天津教案的谈判,乘机机会,他再次向曾国藩、丁日昌等提出派遣留学生的问題。经过曾国藩、丁日昌等联名上奏,容闳的教育计划终于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清政府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留学所需经费由海关拨付,学生年龄从10岁至16岁,招生名额确定为120名,分四批,每年派30人出洋,毕业后回国,由清政府委任官职。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对外国事物不甚了解,加上清政府总是宣传外国是“蛮夷之地”,除了少数沿海口岸与外国人有所接触或是归国华侨略知真情外,老百姓都把到外国去当作“放逐”,谁也不肯轻易送子弟出洋念书。因此,仅招生工作,就让容闳费尽了心血。经过多方奔走,第一批30名留学生全部招齐,他们多为贫寒家庭的孩子。这30名幼童,先在上海的幼童出洋肄业局集中补习英语,作出国前的准备。容闳先行抵达美国,为他们安排居住的地方和读书的学校。1872年夏,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在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在上海登轮出洋,前往美国。

容闳苦心孤诣地经营留学生教育计划,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一生中的“最大事业”。他计划把留学生从幼童时代就送往国外,而且确定学习期限为15年,用意就在于使这批学生能摆脱国内封建意识的影响和束缚,把他们培养成为完全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他们懂得,将来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容闳的这种思想与正监督陈兰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实际上,这种思想与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初衷也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批留学生到美以后,很快就受到美国教育和社会的影响,他们有的剪去辫子,有的脱掉长袍,有的甚至跑到教堂去做礼拜,这些引起了陈兰彬的反感。陈兰彬以正监督的身份不断地向总理衙门控告容闳,要求撤消容闳的职务,调回国内。1875年陈兰彬请假回国,由区岳良接任正监督,陈兰彬再次向总理衙门控告了容闳的“不轨”行为。同年12月,清政府有意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容闳为副公使,实际上是让容闳脱离留学生事务所的工作。容闳在震惊之余,写信给李鸿章,请他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李鸿章经过权衡,觉得留美学生事务所的工作除了容闳外其他人很难胜任,而且要撤销留学生事务所,既不合时宜,也没有理由,于是准许容闳担任副公使的同时兼任副监督之职,让他得以继续负责留美学生的工作。新到任的正监督区岳良与容闳配合得比较好,但是他未满一年就辞职了。1876年,吴子登接替区岳良成为正监督,他是陈兰彬的心腹,处处指责容闳的工作,不断向清政府夸大事实进行指控。吴子登向清政府建议,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容闳对于这种官场上的倾轧十分愤慨。

1881年,容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选送优秀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遭到美国方面的拒绝,吴子登趁此机会再次请求清政府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遣返全部留学生。结果,经慈禧太后批准,下令撤消留美学生事务所,留美学生一律调回国内。容闳的留学生教育计划遂告流产。

投身维新救亡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消息传到美国后,已66岁高龄的容闳深为焦虑,他写信给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提出两条救国方案:一是由他本人前往伦敦,出面商借1500万美元贷款,以购

买军舰,招募洋兵,从太平洋海岸的后方袭击日本侵略军,以牵制日本兵力,迫使日本撤军;二是请求清政府派出一个代表团与西方国家谈判,以台湾作为暂时的抵押品贷款4亿元,用以招募和训练新军。张之洞同意了第一个方案,容闳立即前往伦敦,不辞辛劳地与伦敦有关银行举行了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以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担保,取得英方的贷款1500万美元。但是这项协议遭到了李鸿章和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拒绝。容闳的爱国热情再一次受到打击。

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催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康、梁等维新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诏书,开始变法。9月21日戊戌政变,变法失败。这103天时间,史称“百日维新”。容闳热烈拥护变法维新,称颂光绪是“一位爱国的改革家”,在光绪被囚后,他还专程拜见美国公使,请求援助。容闳因此而成为封建顽固派的眼中钉,被迫逃出北京。1900年,容闳还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勤王起义,被推为“中国国会”会长,事败后,以“勾匪作乱,私运外洋军火”的罪名遭通缉。

容闳的报国热情一次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寄希望于新兴的共和国

1900年9月1日,容闳从上海逃往日本避难,在轮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孙中山向容闳强调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中国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容闳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从一个“维新派”向革命派转变。9月中旬,容闳从日本乘船到达香港。1902年,爱国华侨谢纘泰来到香港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他邀请容闳一同参加起义。他们商定,倘若此次起义成功,就在广州成立临时政府,拥戴容闳为

总统。后来,由于起义的计划被泄露,起义未及发动就遭到了镇压。1902年5月,74岁高龄的容闳无奈地离开了香港,回到美国哈特福德家中,从此,再也没有踏进祖国的大地。

容闳在美国竭力为孙中山进行宣传,鼓动美国人民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理想和推翻清朝的计划。1908年12月,容闳写信给美国友人军事学家咸马里,要求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09年12月,孙中山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再次会见了容闳,容闳当即提出了一个叫做“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朝。1910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诉他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请他与美国友人咸马里和财界人士布思会晤,商谈借款事宜。但是,由于美国资本家与孙中山接谈后不肯冒这个风险,计划流产。

1911年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已经83岁的容闳极为兴奋。他写了许多信给国内友人,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立场,阐发他对共和国安定民生和培养人才等问题的见解。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在百忙中特地向容闳发出一份邀请信,盼望他能回国参加民国的建设工作。这时容闳已中风不能行动,只能委托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职典礼的人,转达他对孙中山和新生共和国的衷心祝贺,期望祖国成为“一个模范共和国”。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家中去世。弥留之际,容闳特叮嘱守候在床边的两个儿子回国服务,以偿他为共和国效劳的殷切心愿。

(任 强)